

DOI:10.3969/j.issn.1000-9760.2026.01.002

# 负性生活事件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 领悟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赵维燕<sup>1</sup> 张帅<sup>2</sup> 张慧杰<sup>2</sup>( <sup>1</sup> 济宁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 济宁 272013; <sup>2</sup> 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沈阳 110034)

**摘要** 目的 探讨负性生活事件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以及领悟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感在其中的作用。方法 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生命意义感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与 Beck 抑郁量表第 2 版中文版对 732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负性生活事件与大学生抑郁显著正相关( $r=0.615, P<0.01$ ), 与领悟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感显著负相关( $r=-0.559, P<0.01; r=-0.280, P<0.01$ ); 抑郁与领悟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感显著负相关( $r=-0.585, P<0.01; r=-0.522, P<0.01$ ); 领悟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感显著正相关( $r=0.326, P<0.01$ ); 领悟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感分别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beta=0.101, P<0.001$ , 中介效应占比 62.73%;  $\beta=0.031, P<0.001$ , 中介效应占比 19.25%) 以及链式中介作用( $\beta=0.029, P<0.001$ , 链式中介效应占比 18.02%)。结论 负性生活事件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既存在直接效应, 也存在三条间接效应路径: 即领悟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感的独立中介以及二者构成的链式中介。

**关键词** 负性生活事件; 领悟社会支持; 生命意义感; 抑郁; 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 B842.6; G4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760(2026)02-006-05

## The impact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on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meaning in life

ZHAO Weiyan<sup>1</sup>, ZHANG Shuai<sup>2</sup>, ZHANG Huijie<sup>2</sup><sup>1</sup> School of Mental Health, Jining Medical University, Jining 272013, China;<sup>2</sup>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4,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on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meaning in life. **Methods** A total of 732 college students were surveyed using the Adolescent Life Events Scal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Meaning in Life Scale, an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BDI-2). **Results** Negative life events show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depression ( $r=0.615, P<0.01$ ), while demonstrating marked inverse associations with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meaning in life ( $r=-0.559, P<0.01; r=-0.280, P<0.01$ ). Depression also exhibited marked inverse associations with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 $r=-0.585, P<0.01; r=-0.522, P<0.01$ ). Conversely,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howed a marked positive association with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 $r=0.326, P<0.01$ ). It was found that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meaning in life played partial mediation ( $\beta=0.101, P<0.001$  mediation effect accounted for 62.73%;  $\beta=0.031, P<0.001$ , mediation effect accounted for 19.25%) and chain mediation respectively ( $\beta=0.029, P<0.001$ , chain mediation effect accounted for 18.02%). **Conclusion** Negative life events exert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n college students' depression, and the indirect effects operate via three pathways: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s a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22CJYJ04); 济宁医学院课堂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22KT007); 济宁医学院高层次科研项目培育计划(JYGC2023RW003); 2023年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JYTMS20231680)

[通信作者] 赵维燕, E-mail: luxizhaow@163.com

single mediator, meaning in life as a single mediator, and a sequential chain pathway of the two variables that brings about progressive effects.

**Keywords:** Negative life events;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Meaning in life; Depression; College students

大学生常面临人际、学业、就业等多方面的压力,但此时他们的身心尚未发展成熟,易出现抑郁情绪<sup>[1]</sup>,若不及时干预,很可能引发抑郁障碍,甚至诱发自杀意念<sup>[2]</sup>。已有研究从外部环境、个体特质与认知过程等多个视角探讨大学生抑郁的影响因素,但其内在作用机制还有待深入。因此,本研究聚焦于负性生活事件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路径,旨在揭示其内在作用机制,以期为大学生抑郁干预提供依据。

负性生活事件可概括为个体在人际交往、社会适应、学习应对等各种问题的总和<sup>[3]</sup>。生态系统理论表明,个体的心理发展深受其所处环境影响<sup>[4]</sup>。个体经历的负性事件容易引起个体的抑郁情绪,可以通过增加反刍思维<sup>[5]</sup>、降低自尊水平<sup>[6]</sup>或激活个体负性认知图式与认知歪曲<sup>[7]</sup>,提升其抑郁水平,这一过程符合抑郁的素质-压力模型,即个体的脆弱素质(如认知易感性)与外在环境压力事件交互影响抑郁,个体的素质越差或易感性越高,触发抑郁所需的压力越低。

领悟社会支持是个体在社交中感知到的被他人尊重和关怀的程度,它是抑郁的重要预测指标之一。研究表明,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低,个体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越高<sup>[8]</sup>;相反,较高的领悟社会支持能够促使个体在面对压力时更易形成乐观预判,激活心理资源,提升应对效能,进而为心理健康提供保护性动力。根据社会支持恶化威慑模型,负性生活事件(如患病、重要关系丧失等)可能破坏个体社会网络的稳定与功能,导致其对社会支持的感知水平下降<sup>[8]</sup>。同时,负性事件本身也可能削弱个体对社会支持系统的信任与利用意愿<sup>[9]</sup>,进一步侵蚀其心理适应资源。领悟社会支持因此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心理缓冲因素,它能缓解个体对压力的主观体验,增强应对困境的信心,促进适应性的问题解决。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负性生活事件会通过降低个体的领悟社会支持能力进而影响大学生的抑郁水平,即领悟社会支持起中介作用。

生命意义感是指个体对自身生命价值的感知与体验,包括对当前生命意义的理解以及主动追寻生命意义的动机,它不仅涉及个体对生活目标和价

值的觉察,也包含其在探索和实现生命意义过程中所持有的积极态度和相应行为<sup>[10]</sup>。以往研究发现,生命意义的缺失,是诱发焦虑、空虚、迷茫等多种负性情绪的潜在因素<sup>[11]</sup>。根据广义紧张理论<sup>[12]</sup>,如果个体长期处于负性生活事件的压力之下,生命意义感水平可能降低,表现为自我怀疑和生命价值感缺失等,若此压力持续累积而未能得到及时调适,可能引发心理健康问题<sup>[13]</sup>。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负性生活事件会通过降低个体的生命意义感进而影响大学生的抑郁水平,即生命意义感起中介作用。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人有安全、归属和爱的需要。对大学生而言,感知到来自他人的支持有助于满足其安全与归属需要,随着需要层次的逐渐实现,其生命意义感得以持续提升<sup>[14]</sup>。然而,当大学生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后,其对所感知社会支持的期望与实际满意度往往会降低<sup>[15]</sup>。领悟社会支持水平降低意味着个体难以感受到关心和帮助,从而削弱其对自身价值和生命意义的体验<sup>[16]</sup>,而生命意义感缺失是抑郁发生的重要风险因素<sup>[17]</sup>。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负性事件会削弱大学生对社会支持的感知与领悟水平,进而削弱其生命意义感,由此增加抑郁风险,形成“社会支持→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路径。

## 1 对象和方法

###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在山东某高校内使用电子问卷进行测查,共调查大学生 763 人,剔除作答时间过短(小于 200 秒)和规律作答问卷,获得有效数据 732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94%。男生 379 人,女生 353 人;城镇 537 人,农村 195 人;独生子女 442 人,非独生 290 人;大一 179 人,大二 155 人,大三 142 人,大四 164 人,大五 92 人;年龄(19.65±1.64)岁。

### 1.2 研究工具

**1.2.1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该量表由辛秀红和姚树桥改编<sup>[18]</sup>,要求被试回答过去 12 个月内,是否发生过项目中呈现的情况。量表共 26 个项目,0

~5 六级计分,测验分值越高,其心理状态受负性生活事件的干扰强度越大。本研究该量表 Cronbach's  $\alpha$  0.947。

**1.2.2 贝克抑郁量表第 2 版中文版** 量表采用 0~3 四级计分,共有 21 个项目,旨在评价被试在过去两周内抑郁症状的程度,分数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重<sup>[19]</sup>。本研究该量表 Cronbach's  $\alpha$  0.976。

**1.2.3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该量表由马弘等<sup>[20]</sup>改编而成,共 12 个测验项目,1~7 级计分,测验分值越高,表明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本研究该量表 Cronbach's  $\alpha$  0.964。

**1.2.4 生命意义感量表** 该量表由刘思斯和甘怡群<sup>[21]</sup>修订,共 10 道测验项目,1~7 级计分,测验分值越高反映个体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本研究该量表 Cronbach's  $\alpha$  0.828。

**1.3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 SPSS 27.0 统计软件对数据实施处理。通过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控制方法学偏倚;采用描述性统计呈现各变量的分布特征;采用 Pearson 积差相关考察变量间的相关程度;最后采用 PROCESS 模型 6 检验链式中介效应,通过偏差校正的 Bootstrap 抽样法重复抽取 5 000 次,获取参数估计值的 95%CI,并以  $P < 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

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析出特征值 >1 的公因子共 11 个,第一因子方差贡献率为 36.85%,低于 40%临界值,提示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尚不显著<sup>[22]</sup>。

**2.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正相关 ( $r = 0.615, P < 0.01$ ),与领悟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感负相关 ( $r = -0.559, P < 0.01; r = -0.280, P < 0.01$ );抑郁与领悟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感负相关 ( $r = -0.585, P < 0.01; r = -0.522, P < 0.01$ );领悟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感正相关 ( $r = 0.326, P < 0.01$ )。见表 1。

**2.3 领悟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运用 SPSS27.0 和 Process 宏程序(版本 4.1,模型 6),通过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5 000 次;把性别、年龄、年级、生源地、独生子女等设为协变量加以控制;把负性生活事件设为自

变量,抑郁设为因变量,领悟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感设为中介变量。结果发现,负性生活事件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抑郁水平 ( $\beta = 0.412, P < 0.001$ )。加入了中介变量之后,结果如表 2、图 1 所示,负性生活事件可显著预测领悟社会支持 ( $\beta = -0.328, P < 0.001$ );领悟社会支持和负性生活事件可分别显著预测生命意义感 ( $\beta = 0.173, \beta = -0.061, P < 0.001$ );生命意义感、领悟社会支持和负性生活事件均可显著预测大学生抑郁 ( $\beta = -0.505, \beta = -0.307, \beta = 0.251, P < 0.001$ )。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矩阵 ( $n = 732$ )

变量	$\bar{x} \pm s$	负性生活事件	领悟社会支持	生命意义感	抑郁
负性生活事件	47.883±24.421	1			
领悟社会支持	60.299±14.317	-0.559**	1		
生命意义感	48.572±10.642	-0.280**	0.326**	1	
抑郁	17.179±16.321	0.615**	-0.585**	-0.522**	1

注: \*\* $P < 0.01$ , \*\*\* $P < 0.001$ ,下同。

表 2 领悟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回归分析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 <sup>2</sup>	F	$\beta$	t
领悟社会支持	负性生活事件	0.563	0.317	56.005***	-0.328	-18.101***
	领悟社会支持	0.396	0.157	19.250***	0.173	-5.642***
生命意义感	负性生活事件				-0.061	-3.386***
	领悟社会支持				0.173	5.642***
抑郁	生命意义感	0.749	0.561	115.276***	-0.505	-12.253***
	领悟社会支持				-0.307	-8.827***
	负性生活事件				0.251	12.458***

以领悟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的路径间接效应为 0.101 (95%CI: 0.069 ~ 0.133),中介效应占比 62.73%;以生命意义感为中介变量的路径间接效应为 0.031 (95%CI: 0.011 ~ 0.051),中介效应占比 19.25%;以领悟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感为中介变量的链式路径间接效应为 0.029 (95%CI: 0.018 ~ 0.040),链式中介效应占比 18.02%。领悟社会支持、生命意义感在负性生活事件和大学生抑郁间的单独中介和链式中介的假设均成立。见表 3。

**3 讨论**

**3.1 负性生活事件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

本研究验证了负性生活事件作为大学生抑郁的重要风险因素,与既有研究结果一致<sup>[23]</sup>。学生遇到的负面生活事件越多,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就越大。面对负性生活事件,个体既有的认知模式和

表 3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效应值	标准误	中介效应 占比(%)	Bootstrap95%CI	
				上限	下限
总效应	0.412	0.020		0.373	0.449
直接效应	0.251	0.020	61.07	0.211	0.290
总间接效应	0.161	0.020	38.93	0.121	0.200
Ind1	0.101	0.016	62.73	0.069	0.133
Ind2	0.031	0.010	19.25	0.011	0.051
Ind3	0.029	0.006	18.02	0.018	0.040

注:Ind1, 负性生活事件→领悟社会支持→抑郁; Ind2, 负性生活事件→生命意义感→抑郁; Ind3, 负性生活事件→领悟社会支持→生命意义感→抑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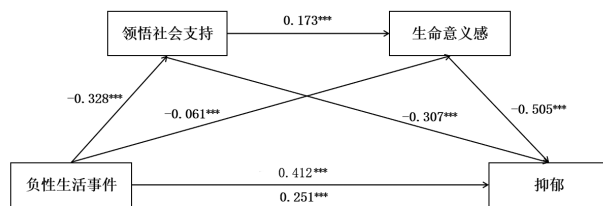


图 1 领悟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路径图

生活结构易受到冲击,进而可能诱发自我能力怀疑、未来无望感等负性认知。此消极认知长期积累后易转化为情绪困扰,导致抑郁症状发生。

### 3.2 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验证了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与前人研究结论一致<sup>[24]</sup>。负性生活事件可削弱学生对社会支持的感知与利用,诱发消极认知信念及适应不良应对方式,甚至导致个体主动回避社交互动,进而降低其对来自家庭、同伴等支持源的感知与评价,这支持了社会支持威胁模型<sup>[9]</sup>。抑郁的人际关系理论指出,消极的人际关系(尤其劣质亲密关系与社会支持匮乏)是导致抑郁的重要因素<sup>[25]</sup>。依据社会支持的缓冲模型,当个体处于压力情境时,领悟社会支持作为重要的心理资源,可以对身心健康起到缓冲和保护作用,减轻压力事件的消极影响。具体而言,当大学生体验到较多的社会支持时,往往能更好应对生活挑战,维持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综上,当大学生面对压力与困境时,来自家庭、老师、同伴等重要他人的及时关怀与支持,能够增强其心理安全感与归属感,从而缓解负性生活事件对心理健康的冲击。

### 3.3 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验证了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与前人研究一致<sup>[26]</sup>。生命意义感是个体应对压力的核心

心理资源,缺乏这一资源的个体难以从负性事件中找到积极意义,更易被消极情绪裹挟。相反,生命意义感水平较高的学生,更倾向于以积极的认知视角解读负性生活事件,将其视为成长的契机而非无法逾越的障碍。这种积极认知有助于个体在压力情境下保持乐观情绪,更多采取问题解决导向的应对策略,进而降低抑郁症状的发生风险<sup>[11]</sup>。Disabato 等的纵向研究发现,生命意义感水平的提高可预测 3 个月及 6 个月后抑郁症状的减轻<sup>[27]</sup>。综上,高生命意义感个体更倾向于对负性经历进行积极重构,采取有效应对策略,缓解压力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降低抑郁情绪的产生。

### 3.4 领悟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负性生活事件能借助领悟社会支持至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路径对大学生抑郁产生影响。具体而言,负性生活事件会削弱个体对社会支持的主观感知,进而降低其生命意义感水平,诱发抑郁症状。若该过程不及时干预,长期持续可能发展为临床抑郁。根据资源保存理论,感知社会支持作为一种重要外部资源,能够为内部资源(如积极情绪)提供外部条件,并促进这些内部资源的积累<sup>[28]</sup>。例如,来自老师、同学、家人等的支持与理解,有助于个体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满足,促进其积极情绪体验。根据积极情绪扩展-建构理论,积极情绪有助于个体拓宽生命认知视角,以更加建设性态度和应对策略面对困境<sup>[29]</sup>,即当经历负性生活事件的个体获得充分的社会支持时,能够建立更为积极的信念系统,从而在压力情境中更有能力寻求解决路径、完成个人目标,并在实现自我价值过程中增强生命意义感,最终降低抑郁发生风险。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 参考文献:

- [1] 陶甜,曹阳,文艺,等.大学生抑郁情绪发展轨迹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5,33(3):529-534,540. DOI:10.16128/j.cnki.1005-3611.2025.03.015.
- [2] 文月黎,金童林.大学生抑郁对自杀意念的影响机制:感知累赘与未来取向的作用[J].济宁医学院学报,2025,48(4):299-303. DOI:10.3969/j.issn.1000-9760.2025.04.003.
- [3] 陈华,贾存显,刘贤臣.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评定及应用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2016,32(8):1116-1119. DOI:10.11847/zgggws2016-32-08-28.
- [4] 刘杰,孟会敏.关于布郎芬布伦纳发展心理学生态系统理论[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9,17(2):250-252. DOI:10.13342/j.cnki.ejhp.2009.02.045.

- [5] 谢湘莹,蔡忠香,刘静芳,等. 负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非自杀性自伤的影响:领悟社会支持与反刍思维的链式中介作用[J]. 心理月刊, 2023, 18(6): 14-17. DOI: 10.19738/j.cnki.psy.2023.06.004.
- [6] 蒋佩,文瑛,刘润达,等. 负性生活事件对大学新生抑郁的影响:自我厌恶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3, 31(1): 110-114. DOI: 10.13342/j.cnki.cjhp.2023.01.020.
- [7] 郭愿志,张承菊,尚云,等. 负性生活事件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负性认知加工偏向和抑郁话题网络媒介接触的作用[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4, 32(9): 1281-1285. DOI: 10.13342/j.cnki.cjhp.2024.09.001.
- [8] 王胜男,刘婉怡,贾绪计,等. 自我污名对 HIV 阳性者抑郁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5, 33(3): 551-554, 468.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25.03.019.
- [9] Norris FH, Kaniasty K. Received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in times of stress: a test of the social support deterioration deterrence model[J]. J Pers Soc Psychol, 1996, 71(3): 498-511. DOI: 10.1037/0022-3514.71.3.498.
- [10] George SL, Park LC. The multidimensional existential meaning scale: a tripartite approach to measuring meaning in life[J]. The J Posit Psychol, 2017, 12(6): 613-627. DOI: 10.1080/17439760.2016.1209546.
- [11] Wang L, Fu J.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ning in life and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a meta-analysis[J]. Cur Psychol, 2025, 44(15): 1-13. DOI: 10.1007/S12144-025-08137-8.
- [12] 杨慧芳. 广义紧张理论研究的新进展[J]. 心理科学, 2003, 26(1): 170-171. DOI: 10.3969/j.issn.1671-6981.2003.01.056.
- [13] 高红梅,李慢慢,马红双. 负性生活事件与大学生生命意义的关系:社交焦虑与公正世界信念的作用[J]. 心理技术与应用, 2025, 13(8): 477-485.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5.08.004.
- [14] Healy K.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by abraham H. Maslow-reflection[J]. Br J Psychiatry, 2016, 208(4): 313. DOI: 10.1192/bjp.bp.115.179622.
- [15] 田雨,丁洪君,郭宗新. 大学新生负性生活事件与手机成瘾的双向关系:领悟社会支持的作用[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25, 41(4): 579-588. DOI: 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25.04.14.
- [16] 王海擎. 社区矫正对象歧视知觉与社会退缩的关系:一个链式中介模型[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25, 23(5): 706-713. DOI: 10.12139/j.1672-0628.2025.05.016.
- [17] 兰丽丽,王晓峰. 大学生价值观生命意义感和主观幸福感与抑郁的关联[J]. 中国学校卫生, 2025, 46(8): 1116-1119, 1124. DOI: 10.16835/j.cnki.1000-9817.2025238.
- [18] 辛秀红,姚树桥.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效度与信度的再评价及常模更新[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5, 29(5): 355-360. DOI: 10.3969/j.issn.1000-6729.2015.05.010.
- [19] 蒋水琳,杨文辉. 贝克抑郁量表第 2 版中文版在我国大学生中的因子结构[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0, 28(2): 299-305.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20.02.017.
- [20] 马弘,汪向东,王希林.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 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131-133.
- [21] 刘思斯,甘怡群. 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版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0, 24(6): 478-482. DOI: 10.3969/j.issn.1000-6729.2010.06.021.
- [22] 周浩,龙立荣.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J]. 心理科学进展, 2004, 12(6): 942-942. DOI: 10.3969/j.issn.1671-3710.2004.06.018.
- [23] 于海波,陈艳玲,张俊杰,等. 生活事件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心理控制源和反刍思维的链式中介作用[J]. 济宁医学院学报, 2023, 46(3): 184-187. DOI: 10.3969/j.issn.1000-9760.2023.03.007.
- [24] Jiang P, Zhang Z, Li S, et al.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on among Chinese university freshmen: a longitudinal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J]. Front Public Health, 2024, 12: 1480394. DOI: 10.3389/fpubh.2024.1480394.
- [25] Stewart JG, Harkness KL. Testing a revised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depression using a laboratory measure of excessive reassurance seeking[J]. J Clin Psychol, 2017, 73(3): 331-348. DOI: 10.1002/jclp.22338.
- [26] Sheng W, Fang S. Impact of moral elevation on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meaning of life: the mediating roles of gratitude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J]. Psychol Res Behav Manag, 2024, 17: 1103-1114. DOI: 10.2147/PRBM.S441272.
- [27] Disabato JD, Kashdan BT, Short LJ, et al. What predicts positive life events that influence the course of depression? a longitudinal examination of gratitude and meaning in life[J]. Cogn Ther Res, 2017, 41(3): 444-458. DOI: 10.1007/s10608-016-9785-x.
- [28] 鲍旭辉,黄杰,李娜,等. 主动性人格对学习投入的影响:领悟社会支持和积极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22, 20(4): 508-514. DOI: 10.12139/j.1672-0628.2022.04.011.
- [29] Roth L, Bencker C, Lorenz J, et al. Testing the validity of the broaden-and 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 a network analytic approach[J]. Front Psychol, 2024, 15: 1405272. DOI: 10.3389/fpsyg.2024.1405272.

(收稿日期 2025-10-11)

(本文编辑:甘慧敏)